

Processo n.º 1309/2019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pena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 15 de Julho de 2021

Assuntos:

- Crime de sequestro

SUMÁRIO:

I - O crime de sequestro visa proteger, fundamentalmente, a liberdade individual, ou seja, a liberdade física, protegendo o direito de não ser aprisionado, encarcerado ou de qualquer modo fisicamente confinado a determinado espaço.

II – Comete o crime de sequestro o arguido que mantinha, por forma de trancar a porta (única saída) com fechadura, o ofendido, contra a vontade deste último, dentro do escritório da sociedade comercial de que ambos eram administradores, ainda que alegasse que, depois disto, estava à espera de que a vítima lhe telefonasse para abrir a porta.

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 1309/2019 號 (刑事上訴案)¹

上訴人：A (A)

上訴標的：第一審法院的有罪判決

日期：2021 年 7 月 15 日

*

一、案情敘述

2019 年 07 月 22 日(開庭日期)嫌犯 A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1-18-0466-PCC 號卷宗)被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觸犯澳門《刑法典》第 152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經庭審後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宣判日期)被裁定控訴理由成立，判嫌犯 A (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 152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緩期兩年執行。

*

嫌犯 A 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理據如下(結論部分)：

1) 上訴人因不服 2019 年 10 月 18 日合議庭作出之有罪判決(現為被上訴判決) - “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 152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暫緩二年執行”而提出本上訴。

2) 上訴人自參與【檢察院】的司法詢問程序開始至作出被上訴判決，一直表示否認作出被指控之犯罪行為。

¹ Por deliberação (nº 251) do Conselho dos Magistrados Judiciais de 14/05/2021, o signatário/relator foi designado para relatar, em acumulação de serviço, os processos-crime redistribuídos nos termos fixados pela referida deliberação.

3)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 c 項之情況，包括出現【可審理的法律問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以及其他法律問題。

4) 因此，應對被上訴判決作出廢止或宣告無效，以及開釋上訴人的全部刑事指控。

5)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方面，有如下上訴依據：

6) 第 1) 點：關於已證事實第三條所述的內容，綜觀所有證言及書證，在庭審期間並未具備充份之聲明可予證明，當中，尤其是涉及“*嫌犯因公司人事變動問題而與被害人發生口角*”的表述，一來卷宗內並未具備這方面的事實依據，二來，眾人在庭上的證言，也沒有對此部份陳述的事宜作出任何充份的證實。

7) 為此，若以此作為隨後證實上訴人的行為帶有主觀意圖時，並作出“關門”之行為，明確出現了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8) 這不是對於合議庭法官 閣下行使《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規定，賦予其對證據之自由評價權力之質疑，然而，僅僅地基於“*嫌犯因公司人事變動問題而與被害人發生口角*”未獲充足事實支持下，繼而對“關門”的行為塗上“*嫌犯意圖藉著將被害人鎖於公司內來發洩對被害人的不滿*”的關聯性，有關的認定明顯是出現了對事實的錯誤判斷。

9) 上訴人認為該判斷有違其本意，這可從一般人士的心態作出評論，站在上訴人的立場，正如卷宗載有的書證，以及眾人在庭上的證言，上訴人一方面已向被害人表述公司全體人士已於 18:00 下班時間到達，應全體下班，因其需要基於保安理由而為公司大門上鎖；另一方面，上訴人已向被害人宣稱若其要在當晚加班工作至大約九時離開時，可致電上訴人作出開門的處理；第三方面，上訴人已吩咐工作人員 B 在涉案公司樓下等待指示，以便收到上訴人電話通知時，可以即時前往公司進行開門，只是沒想過被害人沒有致電上訴人而已。

10) 從這三個方面的事實，可以判斷及認定，上訴人並不具備主觀意圖 - “*藉著將被害人鎖於公司內來發洩對被害人的不滿*”的。

11) 所以，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在判斷本案上訴人的“主觀要件”方面，尤其是認定“關門”的行為是帶有“*嫌犯意圖藉著將被害人鎖於公司內來發洩對被害人的不滿*”的認定，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2) 因此，本上訴應裁定成立，對被上訴判決予以廢止，繼而裁定開釋上訴人被指控的控罪。

13) 第 II)點：關於已證事實第四條所述的部份內容 - “.....，而被害人則向嫌犯表示其需要留在公司繼續工作，惟嫌犯不准許，並隨即拿出一把長約 39.4 厘米及闊約 9.7 厘米的 U 形金屬鎖 (參見卷宗第 3 頁扣押筆錄及 4 至 6 頁圖片)，並準備在被害人仍在公司內的情況下將公司的玻璃大門鎖上。”亦出現了對事實認定之錯誤之情況。

14) 因為，若上訴人對於被害人是否有權留在涉案公司工作至何時的情況有權力，就不會發生本案事件，關鍵在於倘被害人要離開涉案公司時，上訴人是要求其或指定人士，清楚及知悉在被害人離開涉案公司時是否帶走公司的物件。

15) 所以，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上訴人作出了“不准許被害人留在公司繼續工作”，也不存在上訴人作出“準備在被害人仍在公司內的情況下將公司的玻璃大門鎖上。”的行為。

16) 因此，已證事實第四條所載有上述的部份內容，明顯出現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而該部份正正組成了被上訴判決對於上訴人行為構成「犯罪之主觀要件」的元素。

17) 故此，本上訴應裁定成立，對被上訴判決予以廢止，繼而裁定開釋上訴人被指控的控罪。

18) 第 III)點：關於已證事實第五條所述的內容 -“此時，被害人見狀便立即向嫌犯表示會報警求助，惟嫌犯不予理會並用上述 U 形金屬鎖將該玻璃大門上鎖，其後便與 B 時離開現場。”，這裏出現兩個版本，一方面，被害人在庭上的證言指出，已向上訴人及在場的證人 B 作出表示，倘上訴人鎖上大門，被害人會報警求助。

19) 然而，另一方面，上訴人亦向被害人表示，倘其稍後要離開公司時，可致電其作出開門的行為，這點亦獲得證人 B 在庭上印證。

20) 為何被害人、上訴人與證人 B 在庭審過程中都表示沒有聽到對方的說話。21) 這個可能性，可能發生在這個玻璃大門的關閉期間，阻擋了雙方向對方作出的言詞及內容的表述，由於玻璃門的厚度及關閉狀態，有理由相信這是造成雙方均沒有聽到對方的言詞表述。

22) 然而，不能因為出現這個情況，就認定了上訴人的行為存在不符合法律規範的情況。

23) 所以，對於已獲證明第五條的事實“此時，被害人見狀便立即向嫌犯表示會報警求助，惟嫌犯不予理會並用上述 U 形金屬鎖將該玻璃大門上鎖，其後便與 B 時離開現場。”是出現了對事實認定的錯誤。

24) 其實，只要簡單判斷也可作出佐證，若被害人所陳述 -“此時，被害人見狀便立即向嫌犯表示會報警求助”的事實獲得成立，則證人 B 也應一同成為“嫌犯”，但本案卻沒有對 B 的行為予以嫌犯身份認定。

25) 而且，正如證人 B 所表示，其親耳聽到上訴人所指示，在公司所在的大廈樓下等待其指示，這足以證明，證人 B 也認為這個安排是合法、合理及適當的，既平衡被害人在案發時繼續留在涉案公司工作，也平衡了上訴人對於公司保安工作的要求。

26) 若上訴人知悉被害人因上鎖大門而立即報警時，其根本不需要指示證人 B 在公司大廈樓下等待，而證人 B 亦可以於此時拒絕上訴人的指示要求，以便不涉其中。

27) 所以，對於已獲證明第五條所載的內容，明顯出現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而該部份正正組成了被上訴判決對於上訴人行為構成「犯罪之主觀要件」的元素。

28) 故此，本上訴應裁定成立，對對被上訴判決予以廢止，繼而裁定開釋上訴人被指控的控罪。

第 IV) 點：關於已證事實第六條、第八條所述的內容 -“上述玻璃大門為該公司唯一的出口，而嫌犯清楚知悉將該大門鎖上後，被害人便無法離開公司。”及“嫌犯明知被害人仍在上述公司的單位內，仍故意利用一把金屬鎖將該公司唯一的進出口的玻璃門上鎖，意圖禁止被害人離開該公司，剝奪其行動自由。”，上訴人認為存在事實認定的錯誤。

29) 首先，不論是被害人或是上訴人，兩人均是從事涉案公司的建築工程領域多年的人員，有多年的相關領域的經驗。

30) 而涉案公司之玻璃門由上訴人以一把 U 形金屬鎖(參見卷宗第 3 頁扣押錄及 4 至 6 頁圖片)上鎖後，不等於被害人便無法離開公司。

31) 因為，正如被害人在庭上所作出的證言，其在消防員到場後，經檢視該玻璃門及 U 形金屬鎖的上鎖情況，只用了一把十字螺絲批，在消防員的教導下，被害人便可以在涉案公司內

部便把 U 形金屬鎖上鎖的門手柄解開，令玻璃門打開，而這個過程只需要數分鐘。

32) 那麼，這個情節是否反證了“*被害人便無法離開公司*”及“*意圖禁止被害人離開該公司，剝奪其行動自由*”不存在客觀的事實?!

33) 上訴人認為是“*被害人便無法離開公司*”及“*意圖禁止被害人離開該公司，剝奪其行動自由*”的情節是不存在的，這可從下列幾個方面印證：i) 被害人有能力且一早知識可用消防員教授的方法解開 U 形金屬鎖的，因為，被害人是從事建築、裝修及工程界多年的人士，以及被害人在上訴人用 U 形金屬鎖上鎖時，完全沒有任何情緒激動、害怕及慌張的行為表現，而只是在拍攝上訴人上鎖的過程後，使獨自走進辦公室房間內；ii) 被害人在庭審中作出聲明，表示從沒有想過要致電上訴人作出開鎖的請求，而現實中也沒有致電上訴人，而卻直接報警，等待消防員到場後，最終卻在數分鐘後便簡單用了一把十字螺絲批便把 U 形金屬鎖上鎖的門手柄解開，令玻璃門打開。

34) 上訴人認為，不論上述那一情況，在上訴期間獲得證實，就足以引證被上訴決定在此部份存在對事實認定的錯誤。

35) 所以，對於已獲證明第六條及第八條所載的內容，明顯出現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而該部份也正是組成了被上訴判決對於上訴人行為構成「*犯罪之主觀要件*」的元素。

36) 故此，本上訴應裁定成立，對對被上訴判決予以廢止，繼而裁定開釋上訴人被指控的控罪。

37) 關於事實定性的法律問題：上訴人至今也不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為何被害人一直不使用，也不致電上訴人要求開鎖，而是直接作出報警舉動，唯一的原因，上訴人認為，可能被害人藉此對上訴人作出刑事檢舉，至少，這是上訴人的想法。

38) 上訴人認為，上訴人自被害人不離開涉案公司一刻，直至被害人報警求助的一刻，被害人的行為動機帶有佈局性及主觀意圖性。

39) 所以，上訴人認為，這是可以阻卻刑罰中對其作出的處分，甚至可於免除刑罰。

*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答覆，理據如下（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的「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的瑕疵。

2. 上訴人首先質疑「已證事實」第三條之內容—「嫌犯因公司人事變動問題而與被害人發生口角」，認為此部份之事實未予證實，從而不應證實「已證事實」第八條之主觀意圖，尤其是「藉著將被害人鎖於公司內來發洩對被害人的不滿」。[見上訴之結論第 1)至 12)點]

3. 但我們不同意—「已證事實」第二條，上訴人及被害人經常因公司的營運問題而發生爭執，既然如此，在案發日期即 2018 年 4 月 6 日兩人又再意見不合而發生口角是正常不過的事，而且，根據被害人的證言，其當天嫌犯要求被害人準時離開公司，但被害人則要求留在公司加班，試問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立場下，被害人與上訴人又怎會心平氣和，相反，他們肯定在案發當天早上已開始有所爭吵。故此，原審法院根據相信被害人的證言，從而認定「已證事實」第三條的內容是沒有違反經驗法則。

4. 另一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見第 194 頁第四至第六段]中清楚地解釋了其認定上訴人意圖的理由，明顯地，上訴人面對被害人的「不合作」，才想出利用大 U 型鎖鎖住被害人，其透過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來排遣心中不滿，之不過上訴人沒有想到被害人真的會報警，而且是鎖上後「立即」報警。但即使如此，亦不能排除上訴人行為的不法性及故意，因為，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動用私刑，僅為發洩心中不滿而隨意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哪怕只是限制了很短時間的人身自由。

5. 事實上，以上訴人及被害人當時的交惡關係，上訴人又怎會期望大門鎖上後被害人會致電予上訴人求救？！所以上訴人安排證人 B 時在公司樓下等候並沒有實質意義，再者如果上訴人真的沒有企圖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其根本不會用 U 型鎖鎖上公司門口，所以，上訴人的意圖非常明顯，其就是「藉著將被害人鎖於公司內來發洩對被害人的不滿」。

6. 上訴人亦質疑「已證事實」第四條之內容，其認為自己沒有作出“不准許被害人留在公司繼續工作”，以及“準備在被害人仍在公司內的情況下將公司的玻璃大門鎖上”。[見上訴之結論第 13)至 17)點]

7. 然而，被害人的證言足以證實「已證事實」第四項的內容，故此，上訴人現在只是企

圖否定法院形成的心證，嘗試改變法院形成心證的方式。這一切都是從上訴人的個人觀點出發作出的另一種方式審查證據。

8. 上訴人認為「已證事實」第五條的內容是出現了事實認定的錯誤，其認為是由於玻璃門的厚度及關閉狀態，使雙方沒有聽到對方的言詞；另外，其又以證人 B 時的當時表現去證明嫌犯當時的做法是合法、合理及適當。[見上訴之結論第 18)至 27)點]

9. 上訴人質疑「已證事實」第五條的理由是提出了一個可能性 — 由於玻璃門的厚度及關閉狀態而導致各方沒有聽到對方言詞，先不論這個可能性在物理學上會不會發生[試問普通厚度及呈關閉狀態之玻璃門怎會能掩蓋當時各人的高聲發言?!最重要的是被害人的證言中已指出其向上訴人表示「如鎖門就會報警」，則上訴人表示聽不到只是其堅持的立場，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及說服原審法院。由此可見，上訴人在此只是嘗試改變法院心證，並沒有更有力的證據支持之。

10. 而且，證人 B 時為上訴人當時新聘請的員工，其當時對上訴人及被害人的交惡經過只是略懂一二，再者，證人亦沒有鎖上 U 型鎖，所以，作為新員工的證人聽從上訴人的命令[在大廈樓下等候上訴人的電話]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為證人服從上級命令就等同這個命令是合法及合理及適當，此一事實不妨礙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存有犯罪之主觀要件。

11. 上訴人認為「已證事實」第六條及第八條存有事實認定的錯誤，尤其被害人在消防員教導下便可以將鎖之手柄解開，使玻璃門打開，所以被害人無法離開公司的情節是不存在。[見上訴之結論第 28)至 36)點]

12. 上訴人認定被害人有能力自行解開 U 型鎖，故上訴人的行為本質上不能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

13. 然而，這是否能構成《刑法典》中第 22 條第 3 款之「方法係明顯不能者」?我們持否定的立場 — 無論從證人消防員的證言，抑或被害人的證言中均提及「是消防員到場後教導被害人用六角匙拆下門柄」；換言之，這個解救方法是消防員想出來並教導被害人，而非被害人自行做到。

14. 另一方面，上訴人只是單方面認為被害人有能力解開 U 型鎖，卻無法舉出任何實質

證據〔例如上訴人與被害人共事多年，曾看見被害人獨自解開 U 型鎖〕來證明之，這也顯示上訴人僅憑個人觀點而作出的另一種方式審查證據而已。

15.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的判決沒有沾上《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的「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的瑕疵。

16. 上訴人認為，被害人直接報警的舉動，其行為動機帶有佈局性及主觀意圖性，則這可以阻卻刑罰中對上訴人作出處分，甚至可免除刑罰。〔見上訴之結論第 37)至 39)點〕

17. 然而，根據卷宗已證事實及案中證據，被害人從沒有要求或引誘上訴人用 U 型鎖鎖上大門，被害人也從未要求上訴人限制其人身自由，甚至被害人已一早言明「如鎖門就會報警」，但上訴人仍然選擇作出違法行為，那麼被害人面對這種情形下作出報警的決定是合情合理。

18. 上訴人至今仍堅持「被害人應致電上訴人開鎖」的論調，可見其不知悔改，沒有反省自己的過錯，仍決意將所有的罪過推諉予被害人的身上。

19. 最後，雖然上訴人沒有明確指出在此應適用免除刑罰或減輕刑罰的具體條文，但是，我們認為上訴人的行為不符合任何特別減輕的情況，尤其是澳門《刑法典》第 66 條第 2 款 a 項及 b 項之規定。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由於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之駁回。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見卷宗第 244 頁至 245 頁，建議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依法定程序檢閱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經庭審後原審法庭確認下列事實為既證事實：

一、

案發時，被害人 C（以下簡稱“被害人”）及嫌犯 A（以下簡稱“嫌犯”）均為 XXX 工程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該公司設於.....大馬路.....工業大廈...樓...室。（參見卷宗第 111 至 123 頁）

二、

自 2017 年 8 月起，被害人與嫌犯經常因公司的營運問題發生爭執。

三、

2018 年 4 月 6 日早上約 9 時，嫌犯帶同上述公司新聘用員工 B 時到達上述公司，並遇到被害人，其後，嫌犯因公司人事變動問題而與被害人發生口角。

四、

同日下午 5 時許，嫌犯於上述公司內要求被害人及所有員工離開該公司，故該公司的所有員工便離開該公司，而被害人則向嫌犯表示其需要留在公司繼續工作，惟嫌犯不准許，並隨即拿出一把長約 39.4 厘米及闊約 9.7 厘米的 U 形金屬鎖（參見卷宗第 3 頁扣押筆錄及 4 至 6 頁圖片），並準備在被害人仍在公司內的情況下將公司的玻璃大門鎖上。

五、

此時，被害人見狀便立即向嫌犯表示會報警求助，惟嫌犯不予理會並用上述 U 形金屬鎖將該玻璃大門上鎖，其後便與 B 時離開現場。

六、

上述玻璃大門為該公司唯一的出口，而嫌犯清楚知悉將該大門鎖上後，被害人便無法離開公司。

七、

其後，被害人報警求助，而警員及消防員先後到場，並將被害人救出。

八、

嫌犯明知被害人仍在上述公司的單位內，仍故意利用一把金屬鎖將該公司唯一的進出口的玻璃門上鎖，意圖禁止被害人離開該公司，剝奪其行動自由。

九、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並清楚知道其行為的違法性，且會受法律所制裁。

*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嫌犯為商人及醫生，月入平均澳門幣 20,000 元。

需供養父母、外父母及一名成年兒子。

學歷為大學畢業。

三、法律理據

Como 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Este fundamentou a sua decisão nos seguintes termos:

判決書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對嫌犯：

嫌犯 A (A)，男，已婚，商人及醫生，持編號*****2(7)澳門居民身份證，19**年 10 月 1 日在中國廣東省出生，父親 D，母親 E，居於澳門.....馬路...號.....閣...樓...室及中國廣東省珠海市.....路...號.....國際...棟...室，電話：66*****。

*

提出指控以下事實及罪名：

一、

案發時，被害人 C（以下簡稱“被害人”）及嫌犯 A（以下簡稱“嫌犯”）均為 XXX 工程
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該公司設於.....大馬路.....工業大廈...樓...室。（參見卷
宗第 111 至 123 頁）

二、

自 2017 年 8 月起，被害人與嫌犯經常因公司的營運問題發生爭執。

三、

2018 年 4 月 6 日早上約 9 時，嫌犯帶同上述公司新聘用員工 B 時到達上述公司，並遇到
被害人，其後，嫌犯因公司人事變動問題而與被害人發生口角。

四、

同日下午 5 時許，嫌犯於上述公司內要求被害人及所有員工離開該公司，故該公司的所
有員工便離開該公司，而被害人則向嫌犯表示其需要留在公司繼續工作，惟嫌犯不允許，並隨即
拿出一把長約 39.4 厘米及闊約 9.7 厘米的 U 形金屬鎖（參見卷宗第 3 頁扣押筆錄及 4 至 6 頁圖
片），並準備在被害人仍在公司內的情況下將公司的玻璃大門鎖上。

五、

此時，被害人見狀便立即向嫌犯表示會報警求助，惟嫌犯不予理會並用上述 U 形金屬鎖
將該玻璃大門上鎖，其後便與 B 時離開現場。

六、

上述玻璃大門為該公司唯一的出口，而嫌犯清楚知悉將該大門鎖上後，被害人便無法離
開公司。

七、

其後，被害人報警求助，而警員及消防員先後到場，並將被害人救出。

八、

嫌犯明知被害人仍在上述公司的單位內，仍故意利用一把金屬鎖將該公司唯一的進出口
的玻璃門上鎖，意圖禁止被害人離開該公司，剝奪其行動自由。

九、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並清楚知道其行為的違法性，且會
受法律所制裁。

*

綜上所述，嫌犯 A 以直接正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刑法典》第 152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

答辯狀：嫌犯向本庭提交的答辯狀載於第 151 頁至第 152 頁，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二)

審判聽證：訴訟前提維持不變。審判聽證按照適當程序在嫌犯出席的情況下進行。

*

本法院依法由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公開審理，經查明下列之事實：

(.....)

*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答辯狀內與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

事實之判斷：

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其否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稱基於保安理由及 C 要求留在公司工作，其在 C 目睹的情況下將公司的玻璃大門鎖上，並指示 B 時在公司樓下等待其電話以便為 C 開鎖讓其離開；又稱 C 沒有對其明確表示同意讓其鎖於公司內，且 C 沒有 B 時的電話，但其認為 C 有能力在公司內拆下玻璃大門門柄，從而解開涉案的 U 形金屬鎖。

被害人 C 在審判聽證中清楚地講述了案發的經過，其所述與控訴書內容相同，尤其稱嫌犯要求所有人離開並表示會鎖門，其拒絕離開及表明要繼續工作，其向嫌犯清楚表示如鎖門就會報警，但嫌犯仍是將大門上鎖；又稱嫌犯沒有說可打電話叫其開鎖，亦沒有說會回來開鎖；續稱消防員到場後向其提供六角匙並教導其拆下門柄的方法，其照做並成功打開了門。

證人 B 時在審判聽證中就其所知作出了聲明，尤其稱嫌犯對其說因被害人說要工作至晚上 9 時，故嫌犯於 9 時會回來開鎖，其當時持有公司鎖匙，嫌犯指示其在公司大廈的樓下等候，然而，其一直沒有接到嫌犯的電話，故其在附近等了兩個小時後便自行回家，之後其沒有再返回

公司；續稱記得在上鎖前被害人曾打電話及說過如被鎖住就找消防局開鎖，但無印象被害人有否說過會打電話報警。

證人 F 及 G 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案件調查的經過。

證人 H(嫌犯的朋友)在審判聽證中就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

-

經過庭審，雖然嫌犯辯稱其基於保安理由將公司大門鎖上，並指示 B 時在公司樓下等待其電話以便為被害人開鎖讓其離開，然而，B 時表示其等了兩個小時一直沒有接到嫌犯的電話，同時，嫌犯亦明知被害人沒有 B 時的電話。

根據被害人所述，其已向嫌犯清楚表示如鎖門就會報警，但嫌犯仍然上鎖離開，且嫌犯沒有向被害人表示可打電話叫其開鎖，亦沒有說會回來開鎖。

由此可見，嫌犯意圖藉着將被害人鎖於公司內來發洩對被害人的不滿，最終因被害人沒有向其求助而需要警員及消防員到場解救被害人。

綜上，本院認為證據充分，足以認定控訴書內所載的全部犯罪事實。

-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嫌犯及被害人所作之聲明以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 * *

(三)

刑法定性：

《刑法典》第 152 條的規定如下：

『一、拘留或拘禁他人，或使之維持在被拘留或被拘禁狀態，又或以任何方式剝奪其自由者，處一年至五年徒刑。

二、如剝奪他人自由屬下列情況，行為人處三年至十二年徒刑：

a) 持續超逾兩日；

b) 在剝奪自由之前或與此同時，有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折磨，或其他殘忍、有辱人格或不人道之待遇；

c) 佯稱被害人精神失常，以此為藉口而作出；

d) 行為人在假裝具有公共當局身分，或在明顯濫用其公共職務所固有之權力下作出；
或

e) 引致被害人自殺，或其身體完整性受嚴重傷害。

三、如因剝奪自由引致被害人死亡，行為人處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四、如被剝奪行動自由之人，為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款h項所指之任一人，且係在執行其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被剝奪行動自由，則以上各款所規定之刑罰，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

定罪與量刑：

定罪：

根據已證事實，嫌犯明知被害人仍在公司的單位內，仍利用一把金屬鎖將該公司唯一的進出口的玻璃門上鎖，意圖禁止被害人離開該公司，剝奪其行動自由。

基於此，嫌犯的行為已符合控訴書所指控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

量刑：

量刑須根據《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

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嫌犯之動機、嫌犯的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按照上述的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在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為初犯且其犯罪行為為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但其犯罪故意程度高；本合議庭認為嫌犯觸犯《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最為適合。

然而，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考慮到嫌犯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尤其嫌犯為初犯且本案發生於一年多前，本合議庭認為現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因此，決定將上述徒刑暫緩二年執行。

(四)

判決：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現裁定控訴事實獲證明屬實且控訴理由成立，判決如下：

嫌犯 A (A)，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 152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暫緩二年執行。

*

根據 1998 年 8 月 17 日第 6/98/M 號法律第 24 條第 2 款的規定，判處嫌犯須向法務公庫繳納澳門幣 700 元的捐獻。

嫌犯須承擔有關訴訟費用和繳納四個計算單位(4UC)的司法費。

*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98 條第 1 款 d 項之規定，判決確定後，本案對嫌犯所實施的強制措施消滅。

鑑於第 3 頁所述的扣押物為犯罪工具，根據《刑法典》第 101 條第 1 款的規定，於判決確定後，將之充公歸本特區所有，並適時將之銷毀。

*

移送嫌犯的刑事紀錄登記表予身份證明局。

將本判決通知各相關人仕。

如不服本判決，可於二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Quid Juris?

Apreciando:

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teceu as seguintes considerações: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PP) vem o

Ministério Público junt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ronunciar-se nos termos que seguem:

1.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proferida nos presentes autos pelo Tribunal Colectivo do 1.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veio o Arguido A, melhor identificado nos autos, dela interpor recurso.

Da leitura das conclusões da douda motivação resulta que o Recorrente invoca como fundamento da sua pretensão impugnatória o que se encontr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ou seja, a existência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m síntese, no entender do Recorrente, a prova produzida não permitia ao Tribunal recorrido dar como provados determina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a respectiva responsabilidade pena.

2.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sequestr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152.º do Código Penal, na pena de 1 ano e 6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Como vimos, no recurso agora interposto perante esse dout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TSI), o Recorrente imputa ao acórdão recorrido o vício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Trata-se, no entant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de um recurso manifestamente improcedente.

Na verdade, como esse Venerando TSI tem vindo a entender,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ada tem a ver com a eventual desconformidade entre a decisão de facto do Tribunal e aquela que entende adequada o Recorrente» (nestes termos, Ac. do TSI de 18.10.2012, Processo n.º 228/2012 e, no mesmo sentido, mais recentemente, Ac. do TSI de 31.10.2019, Processo n.º 987/2019; Ac. do TSI de 24.10.2019, Processo n.º 815/2019).

O referido erro, tal como está configurad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único que, entre nós,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não se confunde com o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 erro notório é aquele que ressalta evidente da mera leitura do texto da decisão, por si só ou conjugada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apenas esse. Não o que possa resultar da reapreciação pelo tribunal de recurso dos concretos meios de prova tidos em cont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Ao contrário do que o Recorrente parece entender, a apreciação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implica qualquer reapreciação ou sequer controlo da prova produzida em 1.ª instância. É aferido no confronto com o próprio tex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Desse texto tem de emergir de forma ostensiva e evidente que, na parte atinente à matéria de facto, o tribunal recorrido operou de forma arbitrária, contrariando a lógica ou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ou, então, violou vinculação legal de direito probatório ou as chamadas *legis artis*.

Ora, o Recorrente, nas extensas conclusões da sua extensa conclusão limita-se a impugnar a apreciação da prova feit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sem que no entanto aponte qualquer segmento do acórdão do qual resulte, por si só, de forma ostensiva, evidente, manifesta, que o tribunal errou na valoração da prova.

Manifestamente improcedente, portanto,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daí devendo resultar a respectiva rejeição (artigo 410.º, n.º 1 do CPP).

Se assim se não entender, consideramos que deve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porquanto, face ao teor d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resulta que o tribunal tenha operado de modo ilógico, arbitrário ou absurdo nem que tenha infringido vinculações legais em matéria probatória, nem que tenha afronta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3.

Assim, face ao exposto, é nosso parecer, salvo melhor opinião:

Deve ser rejeitado o presente recurso ou, se assim se não entender, deve ser-lhe negado provimento.

Subscrevemos sem reserva a douta argumentação acima transcrita e acrescentamos ainda o seguinte:

1) – Em primeiro lugar, o Recorrente/arguido entendeu que existem os vícios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e fundamentação 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s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0º/2-c) (Fundamentos do recurso) do CPPM, que consagra:

1. O recurso pode ter como fundamento quaisquer questões de direito de que pudesse conhecer a decisão recorrida.

2. O recurso pode ter também como fundamentos, desde que o vício resulte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por si só ou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a)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b)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c)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3. O recurso pode ainda ter como fundamento a inobservância de requisito cominado sob pena de nulidade que não deva considerar-se sanada.

Nesta matéria, importa realçar qu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 resultar do tex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si ou conjugada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ão podendo, pois, estender-se a outros elementos, nomeadamente que resultem do processo, mas que não façam parte

da decisão (C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op. cit., pág.324, e Simas Santos e Leal-Henriques, op. cit., págs.84-85*).

Neste contexto, conforme se assinala no Acórdão do STJ de 20-04-2006, citado aqui em nome do Direito Comparad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referido normativo "consiste em o tribunal ter dado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determinado facto, quando a conclusão deveria manifestamente ter sido a contrária, já por força de uma incongruência lógica, já por ofender princípios ou leis formulados cientificamente, nomeadamente das ciências da natureza e das ciências físicas, ou contrariar princípios gerais da experiência comum das pessoas, já por se ter violado ou postergado um princípio ou regra fundamental em matéria de prova" (*Aresto proferido no processo n.º 06P363 e disponível na Internet em <<http://www.dgsi.pt>>*).

No vício do erro notório está em causa, não o conteúdo da prova em si, nomeadamente o que foi dito no depoimento ou n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cujo teor se aceita, mas a utilização que foi dada à prova objecto de apreciação, no sentido de a mesma suportar a demonstração de um determinado facto.

A apreciação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implica qualquer reapreciação ou sequer controlo da prova produzida em 1.ª instância. É aferido no confronto com o próprio tex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Desse texto tem de emergir de forma ostensiva e evidente que, na parte atinente à matéria de facto, o tribunal recorrido operou de forma arbitrária, contrariando a lógica ou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ou, então, violou vinculação legal de direito probatório ou as chamadas *legis artis*.

No caso dos autos, na prática o Recorrente/arguido acabou por confessar indirectamente os facto imputados, o que ele fez nesta sede recursória não passa de discordar da leitura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fez sobre os factos assentes, estando, por isso, atacando a convicção julgador e não err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s.

O Recorrente, nas extensas conclusões da sua extensa conclusão limita-se a impugnar a apreciação da prova feit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sem que, no entanto, aponte qualquer segmento do acórdão do qual resulte, por si só, de forma ostensiva, evidente, manifesta, que o tribunal errou na valoração da prova.

Pelo que, é de concluir-se pela manifesta improcedência dos argumentos invocados pelo Recorrente.

A propósito do crime imputado, decidiu-se (cita-se aqui em nome do Direito Comparado):

I - O crime de sequestro visa proteger, fundamentalmente, a liberdade individual, sendo essa liberdade a liberdade física, o direito de não ser aprisionado, encarcerado ou de qualquer modo fisicamente confinado a determinado espaço.

II - Comete, em concurso, os crimes de roubo e de sequestro, o arguido que, depois de cometer o primeiro, tendo já na sua disponibilidade ou em seu poder os objectos e o dinheiro do ofendido, o mantém aprisionado dentro do veículo, contra a sua vontade (ac. STJ de 25 de Maio de 1994; *CJ, Acs. STJ*, II, tomo 2, 230).

Vale, *mutatis mutandis*, o raciocínio para o caso dos autos.

É de negar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por manifesto infundado.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O crime de sequestro visa proteger, fundamentalmente, a liberdade individual, ou seja, a liberdade física, protegendo o direito de não ser aprisionado, encarcerado ou de qualquer modo fisicamente confinado a determinado espaço.

II – Comete o crime de sequestro o arguido que mantinha, por forma de trancar a porta (única saída) com fechadura, o ofendido, contra a vontade este último, dentro do escritório da sociedade comercial de que ambos eram administradores, ainda que alegasse que, depois disto, estava à espera de que a vítima lhe telefonasse para abrir a porta.

*

Tudo visto e ponderado, resta decidir.

* * *

四、裁決

據上論結，中級法院合議庭法官裁決如下：

1. 上訴人/嫌犯之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庭之判決。

*

2. 判處上訴人繳 8 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敗訴而產生的其他訴訟負擔。

*

依法作出通知及登錄。

2021 年 7 月 15 日

馮文莊 (裁判書製作人)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